

罗志田 著

权 势 转 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湖北

权 势 转 移



*250.7/17

罗志田 著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



湖北
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罗志田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
ISBN 7-216-02619-5

I. 权…

II. 罗…

III. 近代史—研究—中国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218 号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罗志田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94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1.875
插页:5

版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620

定价:32.00 元

书号:ISBN 7-216-02619-5/K·284

本书主要内容的研究先后受
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基金、国
家教委“九五”规划基金及北美
基督教联合董事会亚洲高教基金
的资助，谨此致谢！

目 录

自序.....	1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 的转移	18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	82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 新旧之争再思 ——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	115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161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191
“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 其人	242
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263

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	290
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 ·····	302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342

自序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如王汎森先生所言,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倾覆之下的困境”。^①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实际上,尽管西方自身在19世纪20世纪也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但对西方来说,即使是与传统决裂,仍可以是在传统中变。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

^①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着它变。在西人的引导之下,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靠其工艺和科技,在此之后尚有更重要的制度和观念。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虽然各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并不一样,“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一旦中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有遵循一个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的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①。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从开始的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发展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观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今人早已视留学为正途,但对有血气的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就像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胡适曾形象地描绘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很明显,胡适正是将近代中西之争视为两个文明之争。中国一方既然竞争失败,就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②自

^①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② 《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收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公司1995年版,第353页。

己就留学且一向颇称道西方的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失败之余，中国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来观念的天下，给他人作了战场。我们如果细查当年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救国救文化的途径，大多与西方有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风行竞争的各种思想体系，即各种“主义”，就极少有不是西来者。^① 中国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中最具标帜性的关键词汇(keywords)如“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也几乎无一不来自西方。从民初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到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再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在均是西与西战。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都有；对西方思想主张全面引进或部分借鉴的也都有，惟独没有全面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不过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假如我们可以把马恩话中的“资产阶级”换为“西方”的话，从鲁迅写前引一诗之时起，虽然“商品的低廉价格”尚在长城之外徘徊，可以说西方已用其他的方式迫使中国人在文化上按照西方的面貌来改变中国的世界。钱穆曾观察到，近现代中国人不论是信仰还是反对孙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据西洋思想来信仰或反对。^② 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维护还是反对中国传统，基本都是以西方观念为思想武器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最多的，不外小脚、小老婆、鸦片和人力车，其中后两样便是西人带来的。鸦片是不

①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②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175页。

用说了。人力车本由日本人创造，不能算纯西洋货，但其流入中国，却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舶来品竟然成了中国传统——即使是坏传统——的象征，最能体现此时西潮已渐成“中国”之一部。而西向知识分子把舶来品当做自己的传统来批判，其实也是受西人的影响。鸦片和人力车就曾被晚一点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并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好几次了。

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思想的混乱和角色的倒置。某些中国人的“西化”甚至超过了西人，而有的西方人倒显得更中国化。通常人到了异文化区域会有一种“文化震荡”现象，但20世纪初出洋的一些留学生到了外国，不仅没有什么“文化震荡”，倒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青年胡适到美国后就有他乡胜故乡的感受；相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庄士敦(R. F. Johnston)回到英国后却感到格格不入。^①

民初的一个诡论性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保存中国文化传统而须由外国人来提倡，正是典型的角色倒置。反之，提倡西化的许多中国士人不仅自己激烈反传统，而且一直在抵制西人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意图。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

^①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庄士敦致莫理循，1913年10月9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通信集》，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235—236页。

[传统的]美妙事物”。^① 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民初以维护国粹为目的的“国粹学派”（以《国粹学报》为主要喉舌）和稍后出现的《学衡》派（其目的与“国粹学派”相近），虽然都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也都在西潮的影响之下。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国粹学派”的史学家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② 特别是《学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还超过大多数鼓吹“全盘西化”者。《学衡》派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③ 这是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的典型例证。这两个学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这里无法详论。但这类人也受西潮影响如此之深，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年版，1926年11月26日（原书无页）。

②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1991年8月），第23页。

③ 为不致误解吴宓意思，兹录其原话如右：“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251页。

如果说“国粹学派”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是一种时人对西方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认同，对民国以后的人来说，这样的认同或者已无必要，或者意义已不相同。从广义的权势观看，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像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分子将舶来品当做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做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对于生在鸦片和人力车随处可见的时代而又非事事都要考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他们所见的“中国”的一部分。吴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强调他是在“承继西洋之道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因为彼时两者已经有些难于区别了。对于更晚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由西向知识分子所传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学”、以及由吴宓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呢。概言之，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

当然，强调思潮冲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问题都为西潮所造成。陈寅恪指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②到晚清早已是问题重重了。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

^① 参见葛佳洲、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较难处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①此外,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②

而传统的“上下之隔”和“官民之隔”,到晚清也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的道光年间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中国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的结果。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只要天下有道,士人就应出仕。而龚生此文竟名为《尊隐》,俨然影射彼时已是天下无道,故士人流向山林,致国失重心。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中国之衰败不待西潮冲击已经开始。

西潮冲击与中国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西潮冲击下中国抵抗的无力恰有助于使中国士人认识到中国自身的既存问题与不足;其次,西潮入侵也给中国带来不少新问题;再次,因西潮入侵引起的新问题常常也起到掩盖中国自身既存问题的作用;最后,西潮本身确也给中国带来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潮的冲击既暴露了也掩盖了中国自身的问题,既给中国增添了新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但是,西潮进入中国既采取了入侵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就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些新来的思想资源。正如蒋梦麟所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③这个形象的表达正提示了近代中国士人在

① 参阅 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第75—106页。

③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四版,第3页。

接受西方思想资源时那种自觉不自觉的踌躇。

近年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倡最力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诠释典范(paradigm)，因其西方中心观所暗含的“文化帝国主义”意味，在中美两国均已不受欢迎。前些年美国新兴的取向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亦即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①近年则更兴起试图寻求一个不受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性约束而更接近历史原状的学术陈述这样一种取向。^②两者的共同点是比以前更注意从中国的历史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有愿望不一定意味着已做到)，这无疑是美国汉学界的新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

问题在于，用一个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不可取；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多就转而以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则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且不说西潮造成的中国问题)的反应多少也可说是对“西潮冲击”的某种“中国反应”。无论如何，研究典范的合用与否是可以辩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如果因为某种研究典范的搁置而使人忽略通常为其所涵盖的重要历史现象，则无异于西人所说的倒洗澡水而连婴儿一起弃置。

实际上，西潮冲击中国引起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等范围内，中外的研究都尚嫌不够深入，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类似“西方”、“中国”这样的词汇涵盖面实在太广，近

^①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参见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与何伟亚(James L. Hevia)等人的相关近作。

代西方和中国都是变化万千，双方又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这一点最为中国的史学研究者所忽视）；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而且，中西双方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特别是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一向都被忽视，以致于相关的基本史实恐怕都需要从头开始进行大范围的重建，这也许会成为 21 世纪中国近代史领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我们才能比较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

说到变的一面，近代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士人面临西潮荡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无疑是近代最重要的权势转移。这些方面的演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在变的共相之下，各领域（比如思想与社会）的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这与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使得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原状相违背。

本书选收的是我近几年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共同研究取向是返其旧心，注重当事人的当下时代关怀，希望获得了解之同情；同时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的藩篱，以拓宽视野（不敢跨出史学之范围者，实因力所不能及）；在不忽视各领域自身发展演变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的仍是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其共同关怀或主题是：1. 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

与传承；2. 中西文化竞争；3. 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特别在民初的）错位；4. 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各文不敢说言人所未言，惟以拾遗补阙为主，或讨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但却重要的面相，或从新的视角据新出资料及一些习见但较少为人注意的史料对一些研究已多的问题提出些微新的诠释。希望能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为重新认识和诠释近代中国打一点微薄的基础。各文均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历史现象，其一个共同之处，即特别侧重于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层面的权势转移。由于充分认识到对近代中国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些文章虽相互关联，仍独立成篇。我的基本看法是：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同时，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